

论清史《续文苑底稿》对常州文派的书写^[1]

戚学民

内容提要 常州文派是清代古文史上的重要流派。清史第四次稿的工作本《续文苑底稿》有对常州古文的记载，学界尚未论及。《续文苑底稿》增立阳湖籍学者恽敬、李兆洛和陆继辂为正传，并在提升为正传的《陆继辂传》首次提出“常州派”之名；以张惠言和恽敬为领袖，建立了一个和桐城派相抗的文派。《续文苑底稿》中的常州派论述与国史馆总纂缪荃孙直接相关。缪荃孙的常州人脉和学术立场等，均在其常州派论述之中得以体现。《续文苑底稿》是“常州派”的重要学术史前史资料，反映了“常州派”历史记载的真意，提示国史纂修是对清代文学史书写具有生成性影响的“历史现场”。

关键词 《续文苑底稿》；缪荃孙；常州派；古文

阳湖文派（或称常州文派，亦称毗陵派），今日的清代文学史中的古文流派之一，对理解清代文章学史全局有重要意义。百年来清代文章学史的研究多围绕桐城派展开，对阳湖派等其他文派研究相对薄弱。截至目前，各家对阳湖派的研究，多聚焦于其本体方面，相应成果以曹虹的创见甚多的《阳湖文派研究》为代表^[2]。

相对于本体研究，阳湖派的学术史研究具有特别价值。如对阳湖派存在与否，20世纪以来文章学史研究未尽有一致结论^[3]。对阳湖派学术史了解不足，影响到了对该文派研究的深入。阳湖派之所以重要，因素之一是它早已以内涵相近的“常州派”等名义出现在清代公私著作中，且影响极大。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最早提出与“桐城派”并立的“阳湖派”名称，历来为学界关注，但与阳湖名义互文的“常州派”记载更需要研究。

本文关注阳湖派学术史之一端，即清史《文苑传》对常州派的记载。清史《文苑传》承载清代官方文学批评，有文章学史的重要篇章^[4]。清代文章学史研究成果丰硕^[5]，但对清史《文苑传》的研究利用不足。《续文苑底稿》是清史《文苑传》第四次稿的工作本，其中对于常州文人的记载极为重要，学界更无专论。如曹虹虽然关注到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的记载，但对该书纂修过程未有了解，因而未能注意到清史《文苑传》对常州派记载

的来龙去脉。本文基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《文苑传》档案，讨论《续文苑底稿》对常州派的记载，以期揭示对阳湖派史的书写具有生成性影响的“历史现场”。

一 名义、谱系与文脉：《续文苑底稿》中的常州派

清史《文苑传》在1884年至1888年，即清光绪九年至十四年，集中纂修，产生了《文苑传》第四次稿。《续文苑底稿》是清史《文苑传》第四次稿的工作本之一，共记载正传74人，附传144人，接续嘉道咸时期纂成《钦定国史文苑传》，记载了清代文坛状况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文章学史内蕴丰富，其对常州派的记载格外有价值。按学界对于阳湖派的存在与否尚有争议，所以曹虹等研究阳湖派，必须从组织形态、代表作家和文章风格等多方面论证其存在。而《续文苑底稿》显示1888年前已正式出现“常州（文）派”之名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第三册以嘉庆人物为主，记载了多位诗文为主要成就者，其中有李兆洛、恽敬、陆继辂三个阳湖人物。此安排颇有深意，首先在于通过为常州文士集中立传的方式，塑造出了一个与桐城派“相抗”的“常州派”名义。

常州派名义出现于《陆继辂传》：“是时常州一郡多志节卓犖之士，而古文巨手，亦出其间。恽敬、张惠言，天下推为常州派，与桐城相抗，继辂及董士锡所作文，亦拔戟自成一队。”^[6]此句出自李伯陶编《国朝文录续编》中《崇百药斋文录引》一文，原文作：“常州一郡，自来多志节卓犖之士，而古文老手亦往往叠出于其间。恽子居《大云山房集》，天下推之无异词。祁孙生与同时，其学问之深博，远逊子居，文章之奇杰，亦远逊子居。而言其胸中之所欲言，字字清回，亦拔戟自成一队。”^[7]此句意在说明陆继辂古文创作成就，为此说到常州一郡的文章学传统，引恽敬以对照。按李伯陶在下文肯定张惠言与恽敬之文在常州齐名，“常州有张皋文者，其文与子居齐名，而集不可得”。此处虽论及常州古文，但并无立派之意。

《陆继辂传》引述与改动李伯陶之文，与《陆继辂传》地位升格同步，颇有巧思。《续文苑底稿》为纂修工作本，留下了工作痕迹。《陆继辂传》就是显例，该书有两个《陆继辂传》，一是《恽敬传》附传，另外一个是被升格为正传者。作为附传的《陆继辂传》，前引文句为：“是时常州一郡多志节卓犖之士，而古文巨手，亦出其间。恽敬《大云山房集》，天下推之无异词。敬生与同时，其所作古文，亦拔戟自成一队。”^[8]该引文较原文简化，但意义没有大的变化。

被升格为正传的《陆继辂传》前述引文变为：“是时常州一郡多志节卓犖之士，而古文巨手，亦出其间。恽敬、张惠言，天下推为常州派，与桐城相抗。继辂及董士锡所作文，亦拔戟自成一队。”衡以原文，凭空多出了“恽敬张惠言，天下推为常州派，与桐城相抗”一句。此更动非同小可，“天下所推”之对象，由原先的恽敬《大云山房集》上升为恽敬和张惠言所形成的“常州派”。

可见《陆继辂传》从附传升格为正传，不仅是陆氏个人地位的提升，更是常州古文作者群的重新定位。李伯陶的话语，本是常见的文人品藻，无立派之意。但有关文句在修改之后，意义巨变，“常州派”名义腾空出世。《陆继辂传》地位升格和传文改写，首要意义在国史中提出了与桐城派相抗的“常州派”。由于《续文苑底稿》具有代朝廷立言

的身份，其意义等于清廷高层承认全国古文除了桐城派，另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常州派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不仅仅为常州派立名，还提出常州派古文家谱系。这是在组织形态上落实常州派的存在。《陆继辂传》前述改写后的文字，编织了以恽敬、张惠言二人为尊，陆继辂、董士锡又成一支的常州古文作者格局。李氏原文只是将陆氏与同郡恽敬对举。改写之后，陆氏古文的比较对象从一个人变成同郡一群人，张惠言和恽敬成为天下共推的常州派领袖，另加入了董士锡。按恽敬为常州古文领军，为学界认可，但要成为在文坛中与桐城派相抗衡的常州派领袖，《文苑传》记载势必加大份量。于是《续文苑底稿》将与恽敬齐名的张惠言拉入，构建常州派。张氏因经学造诣早就在阮元拟《儒林传稿》立传，不能在《文苑传》重复立传。《陆继辂传》巧妙地修改引文，牵出张惠言古文成就，绘出恽、张共同领军常州派的格局。

《恽敬传》为常州派叙事核心，进一步深描了张惠言和恽敬的领袖形象。恽敬早年为官京师，与常州庄氏等交游，与张惠言惺惺相惜，“以教习官京师，时同州庄述祖、庄献可、张惠言，海盐陈石麟，桐城王灼先后集京师，敬与之为友，商榷经义古文，而尤所爱重者惠言也”^[9]。恽张二人治学与为文皆同道。《文苑传》对恽敬古文评价极高。《钦定国史文苑传》中姚鼐弟子陈用光为姚鼐作传，称鼐“所为文高简深古，尤近司马迁、韩愈”^[10]。按韩愈是清代钦定《古文渊鉴》所推崇的古文领袖，《文苑传》将姚鼐文风比为韩愈，是对姚鼐的高度肯定，呈现了桐城派古文领袖风范。《续文苑底稿》对恽敬的记载不遑多让。《恽敬传》记载他为古文，论辩似先秦韩非、李斯以及唐宋八家中的苏洵，雄辩滔滔，而叙事则等同于班固、陈寿，足为楷模。按班固根本儒术，《汉书》行文谨严有法，为后世古典礼范。司马迁和班固向来并称，而《恽敬传》载，“敬自谓其文自司马迁以下无北面”。《恽敬传》评价传主古文，议论和叙事兼擅，思想性和文学性俱备，成就在班马之间，则他作为“与桐城相抗”的常州派领袖信而有征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记载恽敬的治学为文宗旨，进一步突出其求道的领袖形象。《恽敬传》云：“敬少

年好为齐梁骈俪之作，稍长弃去，治古文。”^[11]这句引文的寓意是恽敬走了和韩愈一样的道路，放弃对形式的偏好，追求文以载道。《续文苑底稿》记载其转向古文与张惠言有直接关系：“会张惠言歿，敬闻之，慨然曰：‘古文自元明以来，渐失其传。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，有惠言在也。今惠言死，吾当并力为之。’”^[12]按《续文苑底稿》把这层关系写进国史，颇具深意。细品文意，张惠言是当时文坛中为数不多可以融通两汉、唐宋古文宗旨之人，身为经学家，得“古文之传”。张惠言死，使得“古文渐失其传”的危险成真。恽敬在张惠言生前“不多作文”，死后“并力为之”，是忧古文传承中断，舍身卫道的义举。在学术方面，恽敬与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汤金钊纵论程朱理学和阳明学，力图纠正两家后学偏颇，更“自言其学非汉非宋，不主故常，故其说经能发前人所未发”。传文引吴德璇语，称恽敬是像张载和邵雍一样的大儒。这显示恽敬有对当时汉宋之学皆正本清源、发前人未发的能力，卓然大儒，这是常州派的学术气象，也是恽敬作为常州领袖的极佳印证。

如前所述，《陆继辂传》原为《恽敬传》之附传，升格成为正传，是为常州派名义找一个承载。而这个升格亦有将陆氏塑造为常州文派代表人物，壮大文派队伍之意。传文记载陆继辂富于文彩，成就卓越，“不肯轻涉世事，惟肆力于诗，清温多风，如其人也”^[13]。其交往范围亦广，年十七岁便结识丁履恒、吴廷敬，后又与庄曾谥、张琦、恽敬、洪饴孙等人交往，初登文坛，且名声不局限于常州。陆继辂兄子陆耀遹是附传，传文记其为古文言长于尺牍：“人尤韬精敛采，黯然可思，遇事侃侃，无所疑畏，橐笔遨游，尤长尺牍。”^[14]张惠言之甥董士锡，与陆继辂文风相类，二人构成常州文派的另外一系，使常州文派丰富多元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立有《李兆洛传》，既是强调其人在常州文派中的重要地位，也有彰显常州文派宗旨之意。《李兆洛传》记载其经学根柢两汉，在文章方面则骈散兼擅，由骈文入古文。同时，李兆洛对于常州后学有教育之功：“及治古文辞者，如承培元、宋景昌、缪尚浩、六承如等辈出，皆兆洛所授也。”^[15]“师传”问题，向来为文人关怀，若要

构建派别，也必然要关注延续问题。李兆洛对常州派古文传承有功。

《恽敬传》中另一附传人物吴德璇的记载更富意趣。按今日理解，吴氏师承姚鼐，系桐城派传人，其传记中的删改痕迹凸显了史官对桐城、阳湖两派的剥离。《吴德璇传》稿本原写作：“自桐城方苞以古文法授刘大櫟，大櫟授姚鼐，鼐授诸弟子，益广且远，独张惠言及德璇于姚鼐在师友之间。”^[16]但此处有删改，张惠言名字被删去，变为“独德璇于姚鼐在师友之间”。张惠言与姚鼐之间存在“师友”关系，是桐城与阳湖的交互，本来是事实，修改过后这种关系被隐去，常州诸人与桐城派关系削弱。这显然有利于突出常州派的独立态势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提出了常州派名义，搭建人脉谱系，以恽敬、张惠言为首，陆继辂、董士锡和李兆洛等为分支，并有后学，这样与桐城派相当的一个常州派脱颖而出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对常州派古文重点着墨，突出了常州文不同于桐城文的特点：植根经学，骈散并重。清代常州古文作者学兼汉宋，精通音韵、训诂、地理、天文等。他们治古文，并不废骈文。这与学继程朱，文宗八家的桐城派截然不同。常州派虽以恽敬、张惠言为尊，看似较桐城晚出，但常州一地经学、文章学脉悠久。其文脉上可追梁朝萧统《昭明文选》，自成一脉。明代唐顺之更是提出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古文名家。《续文苑底稿》为清康熙时期常熟人邵齐焘立正传，记他精于骈文，是能将骈散道通合一的清代一人^[17]。主常州龙文书院，阳湖作家辈出，遂有常州派。这为国史叙述阳湖派古文家多始于骈文的表征提供了背景支持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记载，李兆洛为古文，批判只尊唐宋文的做法：“尝病当世之治古文者，知宗唐宋而不知宗两汉。六经以降，两汉犹得其遗绪。而欲宗两汉，非自骈体入不可，因辑《骈体文钞》”^[18]，明确反对当世只宗唐宋，与恽敬、张惠言之见相契合，盖三人皆从骈文入古文。《李兆洛传》论骈文与古文实是人为划分，无根本分别：“自秦迄隋，其体递变，而文无异名。自唐以来，始有古文之目，而目六朝之文为骈体，为其学

者，亦自以为与古文殊路。夫气有厚薄，天为之也；学有纯驳，人为之也。体格有迁变，人与天参焉者也，义理殊途，天与人合焉者也，得其厚薄纯杂之故，则于其体格之变，可以知世焉，于其义理之无殊，可以知文焉。文之体至六代而其变尽矣。沿其流极，而溯之以至于其源，则其所出者一也。”这里借李兆洛说出的是常州为文骈散兼具的典型观点。

由经学入文，是常州派的标志，常州诸人，湛深经术，调和汉宋。学界对此讨论已多，本文不再赘述。此处只引述《续文苑底稿》对常州诸人学术的记载。张惠言以经学成就厕身《儒林》，然亦究心宋学：“先是惠言与仁和汤金钊，同讲宋儒之学。”^[19]《恽敬传》强调传主“长从其舅氏郑环梦暘游”，与“同州庄述祖、庄献可”为友，深于经学。按郑环“于经义多撰述”^[20]，与张惠言同年中举，出大学士朱珪之门，经学功底深厚，后折衷调和于宋学，亦为常州名儒。庄述祖、庄献可出身经学世家，造诣深厚。庄述祖“原本家学，研求精密，于世儒所忽不经意者覃思独闢，洞见本末。著述皆义理宏达，为前贤所未有，五经悉有撰著，旁及《逸周书》、《尚书大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白虎通》，于其舛句讹字，佚文脱简，编辑次序，博引证据，不啻面稽古人也”^[21]。常州庄氏为当世闻人，《续文苑底稿》强调恽敬与其交游，是塑造恽氏经学根基，书写常州派立派之本。恽敬以经学为立身之本，同时不废宋学，折衷汉宋：“敬究心于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，有所见辄笔记之，未暇与惠言辩论往复也”^[22]；“四十后益研精经训，深求史传兴衰治乱得失之故，旁览纵横、名法、兵农、阴阳家言较其醇驳，而折衷于儒术，将以博其识而昌其词，以期至于可用而无弊”^[23]。恽敬的学术有独特的成就，“盖敬尝自言其学非汉非宋，不主故常，故其说经能发前人所未发”^[24]。对于宋学，恽敬亦有独到见解，认为程朱后学束缚天下耳目，与阳明后学眩惑天下耳目，且相詈或相搏，均属不当^[25]。恽敬力持正学，堪比大儒。

恽、张以外，李兆洛亦通经学。李兆洛于江阴书院主讲近二十年：“其间治经术，通音均，习诂训，订舆图，考天官历术。及治古文辞者如承培

元、宋景昌、缪尚诰、六承如等辈出，皆兆洛所授也……藏书逾五万卷，皆手加丹铅，上自汉唐，下及近世诸儒说条别得失，不检故本。”李兆洛还将经学教授常州后学，弟子承培元“通小学，著有《说文引经证例》、《籀雅》、《经滞揭橥》”。

除了文章之学外，《续文苑底稿》常州诸人传记还突出了他们学术经世特质。常州学派学界研究已多，兹不赘述。谨以李兆洛为例，显示他如何被写成学术经世的典范。李兆洛“治经术，通音均，习诂训，订舆图，考天官历术”，“尤嗜舆地学，备购各省通志，较五千余年来水地之书，证以正史，刊定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之与原史不符者”，更著有《大清一统舆地全图》、《凤台县志》12卷、《地理韵编》21卷等。李氏于嘉庆十年（1805年）中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散馆后授安徽凤台县。在凤台期间，李兆洛之重视水利、耕种，在处理地方豪猾之徒时，一方面广设义学，施行教化，一方面缉盗安民^[26]。在剿抚盗贼时，李氏亦会考察其中有气节者，抚而用之^[27]。

综上，《续文苑底稿》提出了“与桐城相抗”的“常州派”的名义，书写了张惠言、恽敬为领袖，陆继辂、董士锡和李兆洛为别支的谱系。国史还记载了常州文根柢经学，骈散兼擅的特色和常州诸人学术经世的特质。今人曹虹为常州学风做出了“融通、致用、多思、文采”的勾勒，而1888年成稿的清史《续文苑底稿》将上述特点全部呈现，把一个形象鲜明的常州派写在国史之中。

二 乡谊、姻亲与学术：缪荃孙与“常州派”的书写

《续文苑底稿》提示我们从纂修的角度进一步理解“常州派”的书写。具体言之，清史《文苑传》中“常州派”的书写，与缪荃孙担任国史馆总纂，承担《文苑传》的纂辑工作直接相关。嘉庆年间，清史《文苑传》第一次稿纂修时，姚鼐弟子陈用光将桐城三祖写入《钦定国史文苑传》，定为文章正宗^[28]。光绪年间，纂述权力的转移带来了文章学史记载的变化，遂有“常州派”的出现。

缪荃孙，江苏江阴人（时属常州府），1882年

起在国史馆任总纂，负责续纂清史《儒林》《文苑》等传，其《文苑传》纂修成果体现于《续文苑底稿》。缪氏于1775年中进士，以庶吉士用，入翰林院。1882年，充国史馆纂修，次年奏派国史纂修，和谭宗浚同任国史馆总纂，负责纂辑《儒林》《文苑》《循良》《孝友》等国史汇传。然而谭宗浚于1884年外任出为云南粮储道，踰年离京。1885年光绪十一年开始，缪荃孙独任其事，《日记》戊子年五月二十八日（1888年7月7日）条：“癸未潘师丁忧，换徐荫轩为总裁。小云丁忧，柳门得山东学政，馨伯辞退，改派李苾园、邓莲裳为提调，谭叔裕及荃孙为总纂。叔裕外简，荃孙独任其事。”^[29]1888年，即光绪十四年五月，缪荃孙将成稿的《儒林》《循良》《孝友》《隐逸》一同上交，《艺风老人日记》戊子年五月二十八日（1888年7月7日）条：“……成《儒林传》上二十二篇、下四十九篇，《文苑》七十四篇，……分并去取，略具苦心……今已完竣交馆。”^[30]其中《文苑》共成稿七十四卷，与今日所见稿本正传人物数量相符。

根据缪荃孙自述，他从1885年到1888年间，独立完成了《儒林传》《文苑传》《循良传》《孝友传》。现存谭宗浚致缪荃孙信中，有分工计划，谭氏设想江苏等地人物均归缪氏记载。但因谭氏很快离开，现存全部传记最后都是缪荃孙提交。我们只能根据《文苑传》档案，认为中常州诸人的传记均为缪荃孙纂辑。更何况《李兆洛传》存有缪荃孙一段按语（该按语为：荃孙按《年谱》无此事，而包世臣详叙之。世臣与先生交最密，当非虚语，据以入传），可佐证这些传记确为缪氏亲力亲为。

细读《续文苑底稿》常州派诸人传记，确实可见缪荃孙的影响痕迹。缪氏在同时纂修的清史《儒林传》中表彰常州庄氏之学，也把其太老师江藩和老师丁晏立为正传。在《续文苑底稿》中，缪荃孙的个人经历、学术倾向等对《文苑传》的常州学人记载同样有深刻影响。前述《续文苑底稿》记载常州派各点，均可从缪荃孙处得到印证。

关于常州派的名义，缪荃孙对常州古文一向有高度评价。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在《集部》即列出“国朝阳湖派古文家集”。此说常被学界认为是常州派名义产生的源头。而《书目答问》是缪荃孙代

为撰写的，此事缪荃孙在致盛宣怀信中自陈：“荃孙同治甲戌为张文襄《书目答问》一手经理……现在无一书不过目，无一字不自撰，直与办《书目答问》一样，先交家内写官录清本，取其熟而能快，改补后再交馆中人写定本……”^[31]。大约可以确定阳湖派古文家的说法出于缪氏之手。在国史馆纂修《儒林传》和《文苑传》之后，缪荃孙曾有编纂《常州文录》之设想。缪荃孙的日记载，1893年三月十一日“校《常州文录》”^[32]，但此书至今不见于各家缪荃孙书目，笔者也未寓目，不知成书与否。今天可见的是1893年癸巳五月十三日撰写的《常州文录例言》^[33]，其中言论与《续文苑底稿》相出入，可为参照：

国朝人文，颺举云合，学文青门，尚沿明季余习，未能领导标新。汇旃守东林之旧，画山受宛陵之传，寔承安溪之学。麟麟炳焕，辉映一时。乾嘉之间学者尤盛，皋文博综经术，子居出入周秦诸子。其为文章，遂有函盖古今，动荡云海之致。祁生、晋卿、仲伦、小岷、保绪、山子，亦各覃心冥追，成就远大，海内属翰之士，目之曰阳湖派，与桐城并称。虽刻本专集，沾丐儒林。撷其菁华，归於兹录。^[34]

这里缪荃孙将清代常州的文章学脉络进行了简要介绍。他认为以张惠言、恽敬为代表，陆继辂、李兆洛、秦瀛等人，被士人认为“阳湖派”，“与桐城并称”。此文与国史《文苑传》在定名方面用心相同，用词接近，阳湖与常州接近，相抗与并称类似，两文构成互文。而各处提到的常州文派谱系也大体接近，《书目答问》提到的是“恽敬、张惠言、李兆洛、陆继辂、董士锡”，《续国史文苑》的是“恽敬、张惠言、陆继辂、李兆洛、董士锡”，领袖和干将大体相同。总之，上述三处“阳湖派”“常州派”的早期记载，均与缪荃孙有关系。

缪荃孙记载常州诸人，除了乡情，还有戚谊。我们看到《恽敬传》浓墨重彩描绘了一个常州派领袖形象。而缪荃孙和阳湖恽家是姻亲。缪荃孙和恽家是儿女亲家。《缪荃孙年谱》中记载了两次嫁女娶妇事宜，均与阳湖恽家有关。一是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正月，缪荃孙长女归于阳湖恽崧耘观察长子毓良。二是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九月，

缪氏为次子禄保聘恽彦彬（辛未传胪工部右侍郎，壬戌同年）女。缪荃孙嫁女于阳湖恽祖翼长子恽毓良，正是他在国史馆任总纂续修《儒林传》《文苑传》时期。这个或有助于我们理解《续文苑底稿》提出常州派名义，并对恽氏作高度评价，树为领袖之举动。

按缪荃孙结亲的恽氏，系常州望族，历代名人辈出，清代中进士者18名。缪荃孙嫁女之恽祖翼曾为浙江巡抚，故居在常州青果巷；为儿娶妇之恽彦彬曾官工部右侍郎，是恽南田后人。恽彦彬之侄恽毓嘉获殿试二甲第一名，官至福建延平知府。恽毓鼎也是进士、翰林院侍读学士、清国史馆总纂，在清末曾供职史馆数年，缪荃孙与他有来往。缪荃孙与同郡望族结为姻亲，合情合理。值得注意的是《续文苑底稿》记载和表彰的常州派领袖恽敬亦为恽南田后人，曾撰《南田先生家传》。《恽氏家乘·仙师著述考略》称恽敬“北分石桥景公派（魁元公支）第六十五世”^[35]。无论南恽北恽，这些人同为一族，均在阳湖。缪荃孙对阳湖恽氏非常了解，对恽敬的感情当较普通乡谊更深。这些情况可为缪荃孙提升恽敬为常州派领袖作一注脚。

更进一步，国史《文苑传》对常州派的记载，并非缪荃孙个人私衷可以概括。常州诸贤本身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关系网络，常州庄氏、赵氏、洪氏、恽氏等等世代联姻，在朝野一直有强大的影响力：比如无锡（当时属常州）秦蕙田曾为相国，秦瀛不坠家声；常州庄氏多人科举中式，在朝任职；被载入《儒林传》的洪亮吉和孙星衍均是儒生名宦；被载入《续文苑底稿》的赵翼不仅是诗人，而且赞襄军务，功绩甚大。洋务运动前后，常州杰出人物持续涌现，影响更强。比如常州人赵烈文，是深得曾国藩信任的重要幕僚。盛宣怀等洋务干员仕途渐入佳境，使得常州影响力日臻强大。缪荃孙与常州诸人有密切联系，是常州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。比如前述他和恽家的关系。又如他与武进人赵凤昌的联系。赵氏早年以佐幕湖广总督张之洞而闻名，在东南互保、立宪运动、辛亥革命中，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缪荃孙称他为“竹君仁兄姻大人”，自称“姻小弟”或“姻愚弟”^[36]。又如夏孙桐，是缪荃孙的江阴同乡，清末曾任职于国史馆，

民国初年与缪荃孙同在清史馆供职，《清史稿》嘉道咸同四朝臣工列传及循吏、艺术两汇传，出于夏氏之手。夏氏也曾助徐世昌辑《晚晴簃诗汇》及《清儒学案》。缪荃孙称夏孙桐为“闰枝大哥亲家大人”^[37]。

不难想见，《续文苑底稿》对常州派的记载背后有常州政商学多种势力的支持。常州朝野士人，颇有重视常州乡邦文献、前辈遗泽者。缪荃孙曾搜集常州诗文集。如1890年，缪氏记四月朔“得赵刻《咸淳毗陵志》《表忠录》《李申耆先生年谱》《暨阳答问》《养一斋诗》《江阴节孝录》《孝悌录》”等多种^[38]。盛宣怀是这方面的典型。

盛宣怀对表彰常州文脉非常积极。他与缪荃孙关系密切，多次委托缪办事。其中有编纂《常州先哲遗书》之命，并请缪荃孙代办。《常州先哲遗书》编选时间与《儒林传》《文苑传》相近而略晚，有凸显常州文脉之意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甲午十二月廿六日，“得盛杏生回电，寄百金催刻书”，大约就是为此事^[39]。乙未年六月十九日“编定《常州词》第廿五卷，《先哲遗书目》毕”^[40]。根据《艺风堂书札》，缪荃孙致信盛宣怀答应为编选效力，“《常州文徵》或刻，《先哲遗书》想有定义，荃孙亦乐预采访之役也”^[41]。缪荃孙为此设想了《常州先哲遗书》的规模和意义：“委拟《常州先哲遗书章程》，窃以为吾郡为文人渊薮，又值吾兄举办，规模必须阔大，使数百年名贤事业、硕士精神自我而传，功德亦未可限量。似未可拘拘文徵之例，与屠静三庶常《骈体文钞》并驾齐驱已也。”^[42]这套丛书旨在塑造常州人文鼎盛的宏大气象，缪荃孙在《续文苑底稿》中记载常州派，也是彰显常州文脉，心意相通。

除了常州本乡人士，在清廷高层还有更多有力人物重视常州学人与文人。曾任国史馆总裁的潘祖荫，是缪荃孙的老师，他将缪荃孙拉入国史馆。潘祖荫就是朝廷的学术领袖，且重视张惠言与恽敬。缪荃孙曾致信潘祖荫：“承赐朱定，敬谢。《茗柯文》全录子居点定，颇便观览。”^[43]此信文辞颇为简略，可知张惠言的《茗柯文》有恽敬的点定本。而恽敬点定的张惠言文集是潘祖荫重视并给缪荃孙看的，这可见潘氏对张惠言和恽敬两家的重视，并

力广流传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的古文记载，涉及古文的定义，也可见缪荃孙的影响。缪荃孙基于经学立场，持骈散合一。前引《常州文录例言》有曰：“古人文辞，不分骈散。”^[44]缪荃孙自己也创作骈文。《续文苑底稿》记载常州派所为古文，正强调骈散不分。

缪荃孙特别关注“真文”。真文和真诗，是历代也是清代文学批评的主要命题。缪氏强调为文之“真”，在于作者的性情识力，于前贤有所依据。他为别人作序时自陈：“荃孙学植浮薄，何足知师之文？犹忆师之言曰：‘文无他长，惟真为难。’呜呼，古今文人传作，其真者能有几人？盖有真性情，始有真识力，有真识力，始有真文章。匪止涂泽以为富，简淡以为高也。”^[45]《文苑底稿》的常州诸人传记中，多描写传主为人之真和学术之正，也是为常州文之真张本。比如，《续文苑底稿》突出记载陆继辂的孝行。陆继辂“九岁而孤，生母林氏，实长而成之”，母亲在其成长为官过程中至为重要：“尝闭置，不令出外。年十七，应学使者试，得识丁履恒、吴廷敬。归告母，母察之，以为贤，遂纵继辂结客，先后交庄曾谄、张琦、恽敬、洪飴孙。”母亲考察后，陆继辂才与常州诸贤交往，这里展现的是孟母择邻而处的贤良。母亲过世后，更是“性至孝，痛禄养不逮，为生母请封典，撰录年谱，求诸同人能文词者，为序讚铭诔等若干篇，都为一集，以传于后，曰《贞珉录》”。孝行乃传统社会中，对人们影响最重的品质之一，尤其在当时清廷内皇帝年幼，以太后为尊的背景下，意义更为突出。而国史的记载，实际是肯定了陆继辂所作是“真文”。学行辞章合一正是“真”的表现。

缪荃孙本人持汉学立场，对常州派诸人记载有影响。缪氏曾入淮安丽正书院，受学于江藩的弟子淮安丁晏，所以他是江藩的再传弟子，也是汉学惠栋一系后学。缪氏也受张之洞的影响：“张文襄公视蜀学，执贖门下为撰《书目答问》，（缪荃孙）始为目录之学。”^[46]张之洞尊汉学，重视“经学入文”，对缪荃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：入翰林院后，缪荃孙“殫心著述，暇即日涉海王村书肆，搜访异本，典衣购取。知交通假，钞校考订，日益博通”，因此“张文襄总纂《顺天府志》招之相助”。甲午

大考翰詹不顺后“张文襄闻而招之，重修《湖北通志》，逾年文襄移督两江，聘主江宁钟山书院”，缪荃孙在此处主讲六年，后又回到常州龙城书院，李兆洛亦曾主讲于此。庚子之变后，“张文襄集东南名流于武昌，以资讨论，先生应招往”。

缪荃孙有牢固的汉学立场。他在续修的《儒林传》中，将汉学人物和宋学人物分开，并称汉学人物部分为《汉学儒林传》。缪氏的汉学立场也体现在《文苑传》中。他强调儒学，尤其是经学对于作文的重要影响。他认为唯有根柢学术，才能作文，这是清代汉学者常见的一种古文见解，以阮元为典型。缪荃孙在给梁曦初文集作序时说：“学术正，法律严，根柢既固，枝叶自茂。”^[47]在为方东树文集做跋时，批判其《汉学商兑》一书的立场，为汉学辩护：“不知汉学间有穿凿，非读破万卷，不能下只字。宋学则明心见性，出自禅宗，迂论妄谈，祸人家国。”^[48]缪荃孙尊崇经学，长于考据、训诂、校勘，文集中载有大量考证文章，如《缪氏得姓考》《尔雅有衍脱文考》《蜀两汉经师考》等。因此，缪荃孙纂辑清史《文苑传》，重视有经学成就的文士，突出常州文人经学成就、学术观点和对古文创作的影响，如突出恽敬、张惠言、李兆洛等人的汉学主张。经过缪荃孙的纂辑，常州古文作者在游学交往、著述成就、汉宋态度等方面呈现出一个认同、践行经学的文人群体。

晚清洋务运动时期，经世之学受到朝野重视。除学术、文章以外，缪氏亦重视经世学术，在近代教育、现代图书馆等经世学问方面亦有造诣。他曾赴日本考察学务，归国后酌定课程，编辑课本，又赴浙江急购捐献书籍，兴办图书馆。众所周知，缪荃孙是今日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的首任馆长，有开创之功。他也强调学问致用的意义。缪荃孙纂辑《文苑传》之时，正是洋务运动时期，缪荃孙在任职总纂，纂修国史期间，为盛宣怀之父盛康编辑《经世文》。今日可见的缪荃孙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始于1888年，多次记载他编选《经世文》的工作情况。如日记第一篇三月朔壬子“校《古微堂默觚》，选入《经世文》，第二天“校《姚石甫集》，选入《经世文》”^[49]除了校对、选文，还有对全书整体结构的编纂。同年七月廿四日缪荃

孙“编录《皇朝经世文续编》学术门，分圣学、原学、儒行、广论、法语、文学、师友七子目”^[50]。七月廿六日“续编《经世文治体门》，分原治、政本、治法、用人、臣职五子目”。七月廿七日“编录《经世文·吏政门》，分吏论，铨选、考察、大吏”。同年八月十二日到天津“交《经世文编》于子渊”^[51]。大致于此完成《续经世文编》的编纂。

我们可以看到清史《文苑传》中，缪荃孙强调常州派诸人经世功业。《李兆洛传》记叙传主在两江总督百龄要求下擒贼一事。如前所述，缪氏特别在此加以按语，说此事载于包世臣所作传中，虽然李兆洛年谱未载此事，但以包世臣与李兆洛相交甚密，说法可信。缪氏辑录此事入《文苑》，与嘉庆年间最初纂修《文苑传》时严格的史料标准已有差距。缪荃孙特意逾矩，盖因此事为剿抚盗贼的后续，二者相连，可以更完整地展露李兆洛的为政能力：“兆洛制坚檻，集异者、护者百余人以待。役引盗至，一讯名姓，立檻解蒙城，与蒙令会印通详解仪征归案。兆洛返之次日，盗竟越蒙狱。”缪荃孙着意引用此次擒贼案件，展示李兆洛策反盗贼，收为己用的成效，凸显李兆洛的政治才干、经世作为。

《恽敬传》刻画了廉明刚正，学术经世的文臣形象。恽氏为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举人，先后任咸安宫官学教习、富阳知县、新喻知县、瑞金知县、南昌府同知、吴城同知。“锐欲以能自効，矫然不肯随群辈俯仰”“廉名素著”“为人负气，矜尚名节”之言，可以大体概括其为官态度。江西新喻任上的恽敬展现了文士的智慧。新喻吏士素横，过严为苛，松则放任。恽敬发挥自身优势，从士之秀异者入手，劝学感化，使当地众人降服于他，怀德畏威，地方政治便可清明。瑞金任上，恽敬拒绝受脱罪之人重金贿赂，自是廉名素著，更加为人信服。文臣多傲骨，恽敬亦不例外。“所至辄与上官忤”，缪氏秉笔直书，最可见恽氏卓然风骨。恽敬最终被劾辞官，“士大夫之贤者咸惋惜之”。士人廉洁傲骨、为文之才与为政之能，在恽敬身上获得了平衡，也为国史增加了一个典型的“优异文臣”。

国史记载“二陆”陆继辂、陆耀遹，亦在官场有所建树。缪氏写陆继辂“不肯轻涉世事”，但其

以举人之身官合肥县训导，甚得时誉称颂，亦有治世才华。对陆耀遹的描写则展露其军事才干。陆耀遹曾客于陕西巡抚朱勋幕府，虽身为文臣，却有武将计谋与风范：“会教匪反滑县，调陕甘总督那彦成至河南……耀遹知兵事濶狭……为陈机宜缓急数十事，因属具草以上入奏，多见施行。”^[52]虽陆耀遹为官短暂，卒于任上，但他的军事谋略在《续文苑底稿》有所记载，非仅是教谕之职。《续文苑底稿》的常州文人在缪荃孙的笔下，呈现出一幅践履苦干，经世致用的文士群像。

总之，《续文苑底稿》中对常州派的书写可见纂修官缪荃孙的影响。缪氏为常州人，对家乡深有认同。他身为总纂，又掌握了纂辑权力。常州人的家乡认同和关系网络，使得常州人对常州文的认同增强，进而凸显常州文脉的地位和价值成为朝野常州士人，特别是某些有力人士的诉求。《续文苑底稿》的常州文派立名成为这个诉求的直接表征。缪氏本人重视真文，重视德行，为人重孝道。缪氏有汉学立场，又受时代的影响，关注经世之学。《续文苑底稿》之中常州文派的相关记载可征诸纂述者的学术行谊。这些可以进一步解释《续文苑底稿》中的“常州派”内涵。

余论

清史《文苑传》对清代古文史有系统的记载，其第四次稿的工作本《续文苑底稿》尤为重要，大体奠定了后来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的规模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增立了三个阳湖籍学者恽敬、李兆洛和陆继辂的正传，并在《陆继辂传》首次推出了可与桐城派相提并论的“常州派”之名。该书在此数人传记内以互文的方式，建立了一个文派的论述。在人脉上以张惠言和恽敬为中心，下有李兆洛、陆继辂、陆耀遹、董士锡等人，并有后学相继。他们有相似的学术根基和为文态度，根柢经学，兼顾宋学，讲求实用，不分骈散。他们的治学为文的立场与传统，与桐城派的程朱理学立场和唐宋文传统有别，形成了一个派别。

《续文苑底稿》中“常州派”的出现，是国史《文苑传》纂述权力的表现。缪荃孙是常州人，又

是汉学后劲。他在《儒林传》和《文苑传》中均提高了常州的地位。光绪年间《续文苑底稿》是常州派成立的一个重要场域。清史《文苑传》第一次稿的纂修官陈用光是姚鼐弟子，他将桐城派写为清代的古文正宗。缪荃孙和陈用光一样，利用纂述权力，将常州派写进国史。

清史《文苑传》第四次稿虽然没有能够进呈，但书稿中缪荃孙对常州文派的书写为此后的清史《文苑传》各稿本所继承。缪荃孙在清朝覆亡后，再次担任总纂，负责纂辑清史《文苑传》，他纂成了清史《文苑传》第五次稿《清史·文学传》。其中的常州派论述换了表现形式，仍旧存在。在《文学传序》中，缪荃孙提出“阳湖张惠言、恽敬、宜兴周济均有声于时，惠言出自经训，敬出自诸子，济出自史籍，有尊为阳湖派以敌桐城者”。他把提法稍加变化，改常州派为阳湖派。同时他指出阳湖的另外一支有桐城派的因素：“而陆继辂序七家文言，源出于桐城，而不尽为唐宋八家所牖，为桐城派振衰起懦，未尝独树一帜。”清史馆内部情势复杂，《文学传序》及其文章学史另有内情，此处可以确定的是缪荃孙既对馆内诸人有所妥协，也坚持了自己二十多年前的“常州派”观点。桐城后学马其昶主导了此后的清史《文苑传》第六次稿的纂辑，他所覆辑的版本成为后来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的底本。在其《文苑传序》中，马其昶仍然承认了“桐城派”和“阳湖派”的并存存在：“于是姚鼐排众议，以义理考据辞章不可偏废，诗文皆渊雅。张惠言汉学巨子，然甚工文，不类经生之繁碎。世称苞鼐桐城派，惠言及其友恽敬阳湖派。此目论也。”

历史进程往往出人意料，如果缪荃孙和马其昶的序文被采纳，桐城派和阳湖派在清史《文苑传》中地位均很牢固。但是缪马两人稿本均经过后续修改，且《清史稿·文苑传序》另起炉灶，用貌似调和的不立派别说，实际否定了桐城阳湖等文派：“师儒崛起，尤盛一时。自王朱以至方恽，各擅其胜。文运盛衰，实通世运。此当举其全体，若必执一人一地言之，转失之隘，岂定论哉……兹为文苑传，但取诗文有名，能自成家者，汇为一编，以著有清一代文学之盛。派别异同，皆置勿论。”这样，缪荃孙从第四稿以来的常州论述就在最后的

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中被消声了。

清史《文苑传》的最后一个稿本《清史稿·文苑传》为世人熟知，此前的众多过程稿被学界遗忘。而缺少过程稿的对照，我们对清史《文苑传》文章学史的解读就出现了某些偏移。这方面最典型的是郭绍虞先生。他认为桐城派是清朝唯一的古文派别，其他的或则为桐城派之前驱，或则为桐城派之羽翼。如阳湖诸人，郭先生虽然认为有阳湖文派，也很正确地指出恽敬之学异于桐城，但认为阳湖文派“只能称之为桐城派之旁支”^[53]。类似郭先生这样的看法，长期在学界居于主流。诸家均对阳湖派作有限的承认，阳湖派究竟能否独立成派，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。

但是清史《文苑传》的古文史原本不应是一元单线发展格局。从纂修的角度说，清史《文苑传》记载的文章学史，要反映整个清史文苑的盛况，负有歌颂圣朝文治的使命，势必不能将清朝古文发展限缩为单一派别。清史《文苑传》纂修长达百年，有多个过程稿。这些过程稿档案显示了一个复杂的文章学史，也承载着纂修官们的学术立场和文艺观点。根据这些过程稿，结合纂修者实际，我们才能对清史《文苑传》的文章学史有不太偏离纂修者本意的认知。

曹虹《阳湖文派研究》改变了清代古文史的一元论述格局，阳湖派的独立身份获得了承认。到21世纪，阳湖派的研究越来越兴盛。但是阳湖派或者常州派研究有一个不足，即缺乏对阳湖派学术史前史的完整梳理，而清史《文苑传》过程稿就是极为珍贵的学术史前史。

清史《文苑传》档案除了提供资料，也有利于我们反思阳湖等文派的生成。我们有关文学流派的概念主要关注作家群体的实体存在。清史《文苑传》文章学史记载显示清代文派生成的方式和路径，还有叙事生成的层面。清人纂修的本朝国史成为文派生成的竞技场。桐城派和常州派这两个古文流派，均是在代表人物身后不久，籍特定有力人士之手，在清史《文苑传》中获立正传，定立名目，构建谱系。这意味着它们获得了清廷高层肯定，进入士林，成为定论。它们从民间形态到获得国家肯定的过程比我们想像的快，《文苑传》似乎成为这些派别生成

的捷径。这提示我们,清史《文苑传》本身是对清代文学史书写具有生成性影响的“历史现场”。

[1]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。另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唐铭鸿同学对本文初稿有很大贡献,谨此致谢。

[2] 曹虹:《阳湖文派研究》,中华书局1996年版。

[3] 按刘声木《桐城文学渊源考》:“惠言、恽敬、陆继辂、吴育、包世臣、张曜孙皆尝言常州文学传自桐城,并无角立门户之见。自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出,始有桐城、阳湖两派之说……不知当日编纂《书目答问》者实为江阴缪荃孙,以乡曲私情分别宗派,引以为重。”参见《桐城文学渊源考》第201页,黄山书社1989年版。郭绍虞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中则将阳湖派视为桐城派分支,“然语其渊源所自,则亦出自桐城,只能称之为桐城派之旁支”,并认为“阳湖文论除恽敬外,无可论述”,参见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第442—443页,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。盖因张惠言壮年辞世,故阳湖一派不足张目。

[4] 截至目前,学界对于清史《文苑传》已经有一些研究。其中对于清史《文苑传》第一次稿,笔者研究较多。笔者曾考证,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题为《钦定国史文苑传》的钞本,是清史《文苑传》第一次稿仅有的钞本。参见戚学民《钦定国史文苑传钞本考》,《文学遗产》2017年第6期。关于清史《文苑传》第一次稿的研究,有戚学民:《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7年第4期;戚学民:《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:〈蒋士铨传〉与清史〈文苑传〉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20年第1期等。关于清史《文苑传》的系统研究目前尚未展开,有关论文有朱曦林:《清史馆与清学史研究之风的形成——以缪荃孙〈清史稿·儒学传〉、〈文学传〉的编纂为中心》,《汉学研究》第37卷第1期(2019年)等。

[5] 相关研究著作很多,此处略举其要者:郭预衡:《中国散文史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陈惠琴、莎日娜、李小龙:《中国散文通史·清代卷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;谭家健:《中国古代散文史稿》,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;熊礼汇:《明清散文流派论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;郭绍虞: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。

[6][8][9][11][12][13][14][15][18][19][22][23][24][25][26][27][52]《续文苑底稿》,文献编号:701005418,卷三,第93页,第56页,第51页,第53页,第53页,第92页,第93—94页,第9页,第

10—11页,第54页,第54页,第53页,第55页,第54—55页,第6页,第8—9页,第94页,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全宗。

[7] 李祖陶:《国朝文录续编》,《崇百药斋文录引》册二十七,页五十四,同治七年敖阳李氏刻本。

[10]《钦定国史文苑传》,文献编号:701008094,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全宗。

[17]《续文苑底稿》,文献编号:701005419,卷二,第47页,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国史馆档案全宗。

[20][21]《光绪武进阳湖县志》卷二十三,页四十五,页五,清光绪五年刻本。

[28] 戚学民:《桐城传人与文苑列传》,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7年第4期。

[29][30][32][33][38][39][40][49][50][51] 缪荃孙:《艺风老人日记》,《缪荃孙全集·日记》第一册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,第20页,第20页,第253页,第261页,第119页,第337页,第367页,第1页,第28—29页,第31页,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31][36][37][41][42][43]《艺风堂书札》,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二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,第324—325页,第347—348页,第354—355页,第313页,第314页,第255页,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34][44]《常州文录例言》,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一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,第137—138页,第137—138页,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35]《恽敬集》,万陆、谢珊珊、林振岳标校,林振岳集译,第68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。

[45][47]《梁曦初先生文集序》,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一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,第159页,第159—160页,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46] 夏孙桐:《缪艺风先生行状》,《艺风堂文漫存》,第1—12页,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版。本段中其余引用均出于此,不一一注明。

[48]《方东树仪卫堂集跋》,《缪荃孙全集·诗文一》,张廷银、朱玉麒主编,第220—221页,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。

[53] 郭绍虞: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,第442—443页,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。

[作者单位:清华大学人文学院]
责任编辑:马勤勤